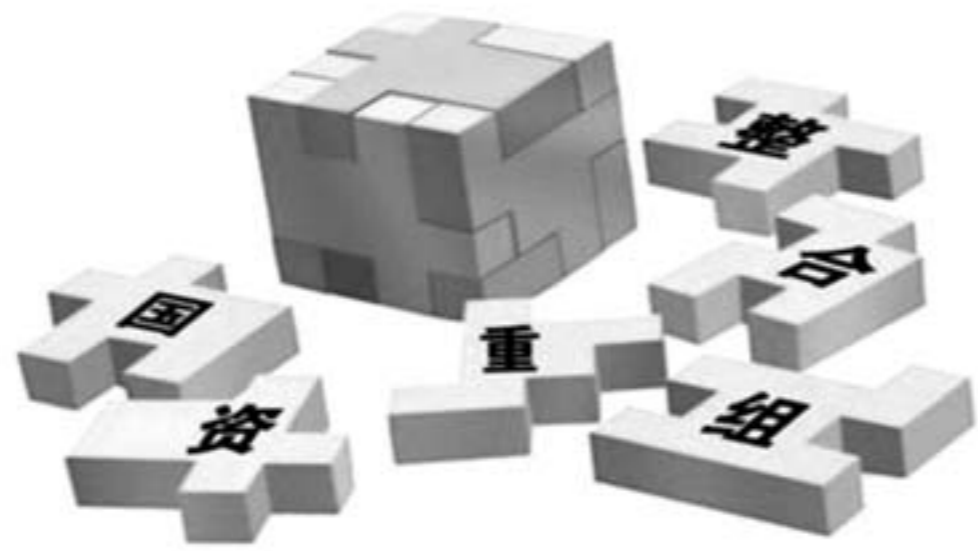


国企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 李东升 刘冰



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系统改革，以“促融合”为新的动力，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长，减少深水区改革的阻力与内耗，才能解决国有企业使命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企业与员工持续全面发展等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经历了探索期、突破期、完善期三个时期，逐步实现了从政府“附属物”向“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资金分开”的市场主体与法人实体的转变。国有企业渐进式改革路径是中国特定经济、政治、思想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企业内外不同利益主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理性抉择的结果，而助推上述三个不同时期改革的动力源分别是“放活、创富、促融合”。

国企及其员工的生存压力推动“放活”机制产生

建国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国家本位论”指导下国有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一切听命于国家被称为“国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完全没有自主权，企业生产经营均由国家计划安排，国有企业实质上是政府的“附属物”。作为生产车间形态存在，整体上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企业活力不足。

国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是能动的有机体，其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企业和员工的物质利益是通过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来实现的，要想发挥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关键是搞好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企业为获得更多物质利益，在具有了一定自主权的基础上，就会自发地萌发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但建国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利益渠道单一，企业员工具有“单位人”的属性，要改善生活物质条件，唯一的希望是在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改善。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缺少“放活”机制，经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无法满足员工改善基本生存条件的合理要求，国有企业员工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改变贫困生活的强烈愿望，长期以来累积了巨大的改革动力。

1978年放权让利改革的发生，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放权让利，利润留成给予国有企业适当的物质激励，并采取企业员工小范围流动，打破了员工身份终身制的惯性思维。奖惩机制刺激了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并带动了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权让利的改革收益为政府和企业、员工共享，实现了多赢的局面，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良性发展。从1978—1982年间，中国工业品产量迅速上升，而当时的工业品主要来自国有企业，长期供不应求的纺织品、家电日用品逐渐实现供需平衡。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44元/年，提高到1982年的836元/年。放权让利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但经济利益如

何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成为难题。为解决放权让利后国有企业出现的有权无责问题，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实行经济责任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形式确立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关系，增强了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强化了企业自身的独立利益主体地位。承包制改革是放权让利和经济责任制的发展，深化与制度化，充分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市场竞争压力凸显“创富”的内在诉求

1992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社会绝大多数产品开始出现供过于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导向的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效益逐年下滑，企业亏损面逐年增大。根据郑海航等学者对国有企业亏损的相关统计，从亏损额、亏损面、亏损率3个指标看，1996年分别为：726.69亿元、37.7%、43.87%，与1992年相比，增加幅度分别为：96.8%、61.4%、55.5%。国有企业大面积严重亏损导致企业职工收入、福利改善缓慢，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员开始向乡镇，“三资”、民营等非国有企业流动，部分技术人员才名义上在国有企业，实际上担任“星期日”工程师。同时，在国有企业内部没有从制度上解决经营层的致富问题，导致以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裁褚时健为典型代表的经营者“59岁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创造条件使得国有企业普通员工、经营者在尽快脱贫致富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补贴，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公司法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为有效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其本质是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法律主体地位的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按照公司法制度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途径。通过改革企业产权制度，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使国家资产最终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实现分离，实现政企分开。明确出资人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份额享有所有者权利，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与法人实体以其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界定不同利益主体的责权利，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使企业及其经营者、员工具备“创富”的制度安排。在具体的运作中，以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为手段，实行岗薪工资制，公开进行岗位竞争，促使每个员工发挥最大的效率，员

工则通过在不同岗位上充分展现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进而推动企业整体效益的提高。同时，通过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在职消费等，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利用股份制为主要形式改造传统产权关系，通过MBO、经营者与员工持股、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协调与证券化，建立优胜劣汰的国有企业竞争机制，将经营者、员工为国有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与其自身利益实现紧密结合，差异化的“创富”动力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促融合”应成为新时期国企改革的动力机制

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创富”改革过程中重效率轻公平、社会责任有所缺失等问题，在全社会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应。

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的高收入与整个社会职工的平均收入极不相称，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垄断性国有企业员工之所以能够获得高收入，除了企业自身不断加大改革力度，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实现了经济效益显著增强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网络甚至国家优惠政策等形成的垄断势力，追逐垄断利润，进而普遍提高了员工收入。而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相互交织，是垄断利润产生的重要根源。

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对企业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企业在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关注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消费者、员工、债权人、竞争者、当地社区、环境、社会公益等。因此，国有企业在确保国有资产增值的同时，应兼顾其他利益群体对其的合理要求。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的中坚和骨干，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且控制力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一定公益属性的国有企业在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供应、价格与质量、环保安全上与社会公众的合理诉求存在不小的距离，其社会责任意识尚需强化。2005年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将有限的国家战略性资源，通过控制成品油资源投放，加快出口成品油，限制对民营成品油批发零售企业的供应等手段，强化企业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导致中国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油荒”事件，更是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中石化、中石化两大公司应尽社会责任的声讨与责难。

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系统改革，以“促融合”为新的动力，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长，减少深水区改革的阻力与内耗，才能解决国有企业使命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企业与员工持续全面发展等现实问题。

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积极引导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防范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外派人员与企业高层合谋，损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度。要严格信息披露机制，公益性较强的国有企业可以适当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同时强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的规制，重构独立监管机构，明确界定不同监管机构的权责以及彼此的制衡与协调机制，有效防范部分国有企业利用垄断优势对民众社会福利的侵蚀，消除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交织造成事实上对非公企业的歧视，为不同所有制利益主体的公平“创富”提供机会，实现更高层次上的“活与富”。在明确不同类别国有企业使命与职能的功能定位基础上，通过设计差异化的绩效考核体系与红利上交比例，科学有效地衡量各类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同时，国有企业应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集约化经营，增强新型国有企业的环保与节约意识，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人的健康安全与环境资源的协调等方面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其社会责任履行更加具体化，最终实现企业自身合理利益诉求与社会公平、责任的有效融合。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由不同产权多元投资、互相融合形成的经济形式，我国出现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源于现阶段实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我国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微观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整体而言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国务院国资委公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共378家，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近60%的资产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户，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但为数众多的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省级国有企业母公司及中央企业二级以上公司层面的股权多元化多停留在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多进展缓慢。针对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长期共存、融合共生的现实，只有通过国有经济布局和调整的战略性调整以及治理的不断优化，才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应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上，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大国有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融合进程中，企业内外各参与主体不断进行着利益分化与重新调整的动态融合，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治理边界，并通过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激发各参与主体进行价值创造的积极性。

(李东升：山东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冰：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在垃圾场作竞选演讲

□ 六六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垃圾场，整洁、优雅、敞阔、细致；垃圾分类之细密，种类之繁多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在我眼里，它是一个亲力环保的秀场，更像一个小镇的社交场所。

小镇威尔斯利地处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西，它的闻名，源于镇上有个著名的威尔斯利学院，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奥尔布赖特都毕业于此。我们华人知道它，是因为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毕业于这里。

来美之行，有一站是拜望刚来威尔斯利定居的一位中国朋友。车一驶进小镇，立刻喜欢上了！新英格兰风格的建筑每幢都别有情致，门前是开阔的绿地，屋后是葱郁的森林，朋友说第一夜到这里入住就报警了，因为后院有仓库的响动。警察两分钟就赶到，但环顾四周并无异样，第二天早上在庭院里早餐，才发现是一头雄鹿迈过森林过来高傲地探望他。

我去朋友家的时候，他很懊恼，说是特地去垃圾场，却发现垃圾场关闭了。次日再去，说是麻省在竞选州长，垃圾场被用作竞选演讲的基地，全镇人民在此被拉票，又不能倒垃圾。貌似倒垃圾对他，是一件很难又很重大的事，这也引起我的好奇，没听说在垃圾场拉票的，扔东西不好啊？在他第三次去倒垃圾时，我执意跟过去看看。

这一下，看出一片新天地。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垃圾场，整洁、优雅、敞阔、细致。在我眼里，它是一个亲力环保的秀场，更像一个小镇的社交场所。驱车驶进垃圾场，居民可以根据每个大型指示牌，开始分丢各种垃圾。分类之细密，种类繁多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仅玻璃瓶就分透明玻璃、绿色玻璃、蓝色玻璃、褐色玻璃、一磅玻璃、两磅玻璃；还有铝制品、塑料袋、纸制品、油漆、液化气罐、可被再利用的旧货、旧书、建筑垃圾、庭院植物垃圾等等，最后出口处是日常的生活垃圾，那是唯一有垃圾味的地方，偶有熟悉气味传来。

朋友初来乍到，英文不是很好，分拣得很吃力，幸好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图片帮忙，让他能够找到各种垃圾的去处。这回丢垃圾，朋友很不好意思，因为昨夜朋友聚会烧烤，我们把杯盘都扔在垃圾袋里，后来扔的时候才发现大部分居民们会把垃圾洗得崭新才扔，玻璃瓶是不带残渣的，以保证没有异味。

这次丢垃圾，还有意外的惊喜。我们路过各种气罐收集站时，朋友发现有一罐新罐子存在里面，长得很喜人，顺手一拎，竟还有大半罐气。朋友很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拎回家，省得找地方买了！”

事实上，镇上居民还把这里作为交换站，谁家孩子长大了就把摇篮放这里让需要的邻居自取，还有洗干净缝线的娃娃，园艺的工具，不用的家具，成色都很新，镇上很多居民悠闲又娴熟地挑选旧物。小镇不大，所以大家都是远亲近邻，没事还拉着手聊聊天，发现不认识我们，还过来打招呼，欢迎新朋友。

在图书栏里，我给儿子选了几本儿童读物。旁边两个中年男女聊得热火朝天，如果我没理解错，这两人把垃圾场的旧书店当约会的地方了，两人正渐生情愫。

在我拍照的当儿，有位优雅的老年女士走过来主动介绍这个垃圾场。她说这个垃圾场是她一家从她母亲起自1972年始致力兴办的，她现在每天在这里做义工。如果对这桩生意感兴趣，可以联系她或者垃圾站长。我好奇地为她什么称垃圾场为“BUSINESS”，经她介绍才知道，原本垃圾场分拣由清洁公司来做，镇上家庭每月缴纳300-400美金，后经集体投票决定各家自送。日子久了，垃圾场的热闹程度堪比市政广场或者花园，成为社交圣地，并且，该垃圾场除除去管理人员的开支，每年靠卖垃圾能为小镇收入65万美金！虽然数字不大，但对小镇人民来说是鼓舞，该钱可用于道路维修或公共用电。

这个垃圾场，成为我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威尔斯利小镇是美国的富裕小镇之一，镇上居民除了原本祖上就有遗产的富二代以外，还居住着医生、教授、律师，甚至还有演艺明星或球星。房价不便宜，一个月出三四百块却一周倒两次垃圾的麻烦也许着会，却丢掉了“举手环保，环境更好”的机会，更丢掉了在社区里与邻里和谐相处的时间。怪不得倒垃圾在镇上是一件大事！

我由是想到我们国家的垃圾分类。作为密集的都市，每个社区有这样的垃圾场可能比较奢侈，但跟威尔斯利小镇比，我们的环保意识还是落后了。如果我们也能把垃圾经营成不仅是保护环境，更是造福社区的生意，如果每个居民都能熟练地分拣垃圾，高素质地清洗垃圾，那么我们的环境和社区，会因此而更健康，更友善！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

(作者系著名作家、编剧)

泰山角色的三次“转身”

□ 吕书宝



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的不同时期，泰山曾经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泰山角色转换的灵动不居，与时俱进，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和创新发展。历史上，泰山角色起碼经历了三次华丽转身。

从封疆符号到祭祖圣地

泰山并非刚开始就享有后世所谓“五岳独尊”的地位。现存最古典籍《易经》中，历代国君祭祀的神祇是在“西山”上，并且明确指出是陕西的岐山，跟泰山没有关系。到了唐尧虞舜时代，尧帝和大臣们讨论问题时，曾经提到过“四岳”，但是后面的文字中有“岳曰”字样，那四岳应当是人，而不是后世所谓“五岳”一样的山名，是官职名称。

到了山东济南人虞舜执掌中原政权的时代，舜在上朝时也有“四岳”之类的招呼，下面有“金曰”(都岳)之类的回答，说明这四岳是四个人并且分管四座山(包括泰山在内)为标志的四方。当时文献中有诸如“至于岱宗”、“至于南岳，如岱礼”之类的记载。其中的“岱”就是泰山，当时祭祀泰山的日期是二月(夏历)，刚好是周历的四月，和现在的泰山庙会(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生日)是一个时段。其中提到诸山祭祀规格都不许超过泰山，那泰山不是四岳独尊也是排行老大了。

不过成书在孔子之前的《仪礼·鬯礼》中有这样一段话：“诸侯觐于天子，……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祀“山川丘陵”要到西门外，泰山在当时的国都东面，因此天子遥祭的应该还是《易经》中所说的“西山”，亦即岐山。同一个文献中还有祭天在都城东门或者南门外记载，因此也不用到泰山来祭拜。

如此看来，泰山在西周即《诗经》时代之前，只是作为封疆符号、官职名称出现在典籍中的。至于《尚书·舜典》中记载“巡守(巡狩)祭祀泰山的情况，除了是五年一次因此算不上“经常”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舜帝是个大旅行家，又是山东济南人，把泰山山神祭祀作为旅行途中四望山川祭祀的参照，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表现。泰山的声名鹊起，还要始于《诗经·鲁颂》中把泰山作为鲁国自己的祭祖场所。

从区域圣地到天柱地维

鲁国祭祀祖先的《诗经·鲁颂·閟宫》是西周中期以后的作品，其中有“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之类诗句。诗中把鲁侯比作泰山，可以看出泰山在鲁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这之前发祥于鲁地的殷商先人，也在其庙堂乐章也就是主流文学《诗经·商颂·殷武》中提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这景山应当也是泰山。“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这句诗附着神话是天地仙女吞鸟卵生殷商始祖，并且和西王母、玉女有关，这天地只能是泰山瑶池。所以，殷商部族的发祥地应该也是在泰山上。《商颂》非但写了泰山，而且写得很神圣。汉语中有“景仰”这个词，他们对泰山还是很“景”仰的，只不过没有直呼其名罢了。

总而言之，到了春秋前后的《诗经》时代，泰山已经属于名副其实的区域圣地了。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那俯瞰人寰的气概绝非只是缘自泰山的高不可攀。

可以说，天柱地维的观念是冲荡于圣人胸中的，圣人出生、钟情的地方，自然是圣地。战国时代稷下学宫在泰山脚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始皇泰山刻石流芳百世，都是天柱地维情结的淋漓展演。

从心灵圣地到身心胜地

虽然《史记·封禅书》中有七十二帝王封禅泰山的记载，但是现在一般认为正式(或者最著名的)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的只有六位帝王，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其中秦始皇的自欺自播、唐高宗的灰头土脸(强撑病体，大权旁落妾妾出身的宠妃武则天)、唐玄宗的狼狈失据(二度任杨贵妃，人仰马翻支离破碎)、宋真宗的假模假样(自己想封禅还设计让别人“劝封”)、劳民伤财还假设为民祈福，都消减了泰山封禅的意义，甚至湮灭了天柱地维的神圣。

只有汉武帝封禅泰山属于可圈可点的旷世盛举：此公即位后埋头苦干，发展经济、张扬文化，开疆拓土的同时就能做到太平天下，国泰民安，奋斗30年之后的公元前110年，才到自己向往已久的泰山祭祀封禅，更改年号，振奋国威，因此历代关于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的盛况多有盛赞之辞，此不赘述。

但我们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在其人生的最后20年(公元前109年—公元前89年)中，先后七次封禅泰山，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也饱受史家的抨击。如班固称自己忧伤九十多岁的齐人丁公说：“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这就是对汉武帝“动机不纯”封禅的一种揶揄和嘲讽。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汉武帝的多次封禅，才完成了泰山本身从心灵圣地到身心胜地的转换。这种转换的最终完成，是由他的子孙汉光武帝刘秀来实现的。

刘秀比汉武帝还低调，在他即位三十二年(公元56年)时，才自己找借口(“赤刘之九，会命岱